

# 文化多元背景下青年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研究

■ 周培源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传播学部,北京 100024)

**【摘要】** 互联网的接入和普及,加之包括微博微信等在内的移动社交平台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给青年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文化认同带来了冲击。主流文化的编码方式不符合青年的个性与认知习惯,导致青年在解码过程中产生误解与误读。作为核心的传播媒介,主流媒体存在“边缘化”倾向,新型主流媒体的平台建设滞后。在主流文化的传播传承这一“双向塑造”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在尊重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强调沟通互动,打破“高语境”的怪圈,才能扎实推进主流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与传承。

**【关键词】** 文化多元 青年群体 文化传播 主流文化认同

## 一、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

青年群体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我们大力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青年对于这些主流文化的接受与认同实际上成了考察主流文化能否得到有效传播传承的重要依据。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一直处于比较暧昧的状态,鲜有权威的实证调查数据予以论证,因而对于主流文化的传播效度的研究往往会有一种“空中楼阁”的嫌疑。来自199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中国青年社会政治心态状况调查”是基于北京市的调查结果,被许多后来研究者广泛引用。如《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社会心理》一文,就引用上述调查认为“社会主流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得到大多数青年的认同”<sup>[1]</sup>。

但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调查结果是否还能继续反映现实?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因互联网的接入和普及,包括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在内的移动网络崛起的背景下情况又如何?本文将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践反思。

首先,对“青年”概念的界定。有研究专门梳理了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5-11-28

作者简介:周培源,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传播、传播学理论。

法学、美学、教育学等学科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针对青年的专门研究,概括出不同的青年概念<sup>[2]</sup>。一般而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划定一个年龄范围,但实际上这项工作本身也充满争议。如黄志坚就认为,我国目前的青年年龄界定,可以说是“政出多门”、“论出多家”,莫衷一是。有据可查的,关于青年的年龄目前至少有7种不同的界定<sup>[3]</sup>。这实际上提示我们,青年与其说是一种生物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造物<sup>[4]</sup>。因而,本文关注的青年群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统计定义”的青年,而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青年”。

其次,本次话题的讨论环境是基于新媒体的“文化多元”场景。一般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含义是多层次的,它可以表征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以指导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维方式转变到多元式思维方式,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sup>[5]</sup>。关于“两个舆论场”的讨论就是很好的现实脚注。尽管它强调“融合、对话”,但还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中国的舆论格局不应当是简单的官民二元划分,而应当是基于不同观念、文化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分层”,通俗而言就是“物以类聚”而形成自己的观念话语,彼此集体吐槽抑或抱团取暖。这便是本文讨论的具体语境。

最后,对主流文化内涵的界定。一般认为主流文化是指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有研究者就认为,所谓主流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倡导的、起主要作用的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sup>[6]</sup>。王一川就指出,主流文化能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sup>[7]</sup>。但也有人指出主流文化应该超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狭义框架,更加开放包容。鉴于本文研究的现实和语境,这里的主流文化特指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情况,即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sup>[8]</sup>。需要指出的是,主流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不断“进化”,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无论主流文化的内涵外延如何变化,它都有对应的其他文化形式与其并行不悖,并同处于上述的文化多元的环境之中。

## 二、从文化元素到受众立场:三个维度的推进

威廉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大众文化文本或实践中都能找到某些元素,他把这些元素区分为“宰制元素”、“寻常元素”以及“剩余元素”,每一种元素都会把文本向不同的方向牵引,而这些元素如何起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进行文化生产及消费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sup>[9]</sup>。

因而,这个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经典的模型,即葛兰西的“霸权”模式,而葛兰西最初的原意是用“霸权”来指涉社会统治集团如何通过“智力与道德领导权”来赢取被统治集团的赞同<sup>[10]</sup>。断然将这一模型套用在中国实践中,显然并不合适,因为上述两者的互动并非在葛兰西所言的富有冲突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文本与实践体现出的“抵抗”与“收编”交流、协商和互动后的“均势妥协”状态<sup>[11]</sup>,毋宁说这里是一种更加突出受众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文本接受的实践。

霍尔在雷蒙斯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构建起了一套“受众立场”的理论。如果说,雷蒙斯“文化三元素”的分析是开山创举,那么霍尔则是把它上升到具有解释力的第一阶段理论,从编码解码的角度考察了文本如何可能影响受众;接着,霍尔的学生兼同事莫利推进研究,并对理论作出修正,重视了话语和主观性因素。因此,不难发现,在今天文化多元背景下,青年对于主流文化的接受情况自然而然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即编码解码层面的文本生成和解读的过程;第二个维度即蕴含着主流文化的文本与实践如何在当今现实社会中契合社会环境、受众主观性因素等作用于青年群体,是一个协商传播的过程;第三个维度即以一种宏观视角考察政治参与

的进程中,主流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和传承究竟如何改变了传播的主客体。

### 三、现实分析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找到评估和反思当前主流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进路。

从第一个维度来看,主流文化的编码阶段存在一些问题。在一些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容易出现“多种媒介、一种声音”的情况,而作为主流文化,也很容易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显露出一元的、绝对的、排他性的倾向。在今天,虽然说情况有了改观,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首先,从内容上看,主流文化呈现的内容样态与青年群体的个性与认知存在差异。青年的朝气和创造力使得其更愿意尝试接受新奇的观念,而主流文化如果还继续以老面孔示人,老瓶装旧酒,显然难以赢得青年人的关注与追随。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社会格局下,除了主流文化,还包括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等多种相互重叠甚至在某些领域相互竞争的文化样态,主流文化如不改变,就很难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其次,从编码方式上看,传统单向宣传说教意味明显。尽管我们早已认识到“宣传”的负面效应,也将 propaganda 更改为 publicity,但在实践中,宣传本位的思维还没能祛除,以双向对话为导向的、以协商沟通为取向的传播观念并未形成,也即编码过程中,编码者高估了文本传播的效果,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传播是高效的,加上传统认识上的强大动员系统,没能将青年群体的新特点纳入编码考量的范围,造成编码失真的情况,为后面的解码和误读埋下隐患。

最后,从输出文本结果上看,很多时候编码并不成功。这与宏观的社会形态有关联,容易走上两种极端。一种是常见的硬宣传,往往收到负面效果;另一种恰恰相反,即爱德华·霍尔所言称的“高语境”的问题。根据霍尔的观点,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来传递,或内化于交际者的思维记忆深处,显性的语码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人们对交际环境的种种微妙之处较为敏感<sup>[12]</sup>。高语境所暗含的“意会”、“领会”等因素加重了误读的可能性,在解码中雪上加霜。

这三点编码的累积问题归结到解码阶段,就很容易产生偏差和误读。(1)从编码者把关后的内容来看,尽管主流文化内在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但很难契合青年群体的认知和口味,进而从根本上抗拒解读,出现选择性忽视;(2)从编码方式来看,固守传统的动员基调,以机械的单向进路进行运动式宣传,并不能引起青年群体的兴趣;(3)极端的主流文化文本很难走近青年群体的生活,归根结底,没能从微观层面抓住青年的眼耳口心,传播效率大打折扣。

从第二个维度来看,封装好的主流文化如何顺应时代环境润青年于无声呢?即便我们说第一个维度编码问题成功解决,那么第二个维度依然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在讨论主流文化的传播问题上自然离不开媒介这一关键要素,但显然目前的主流文化传播仍然依靠“主流媒体”,而主流媒体传播的时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流文化的传播效果。在传统时代,尤其是媒介欠发达的时候,民众少有选择。但在如今这个时代,生活在各种媒介的环境中,青年群体很容易用眼睛、用耳朵投票,选择新型媒介作为自己的信息接收平台,传统的“主流媒体”反而被“边缘化”,加上有很多主流文化宣传任务的硬要求,更加剧了其“边缘化”的程度,并恶性循环。

其次,在对话模式上也存在问题。尽管不少主流媒体求新求异谋发展,新媒体平台建设颇有成效,但不容否认,在大部分主流文化的宣传中,沟通的方式还是以“告知”为主,“喊话”为辅,中介是媒体,但是显然缺乏成熟的对话机制。“告知”更多的是单方宣传主导的,“喊话”虽

比“告知”进了一步,但基本还是通过中介进行的信息交换。文化的沟通应该更依仗磨合、交流、协商,现阶段的对话模式并不尽如人意。

最后,社会的环境既是主流文化向青年群体传播传承的时代背景,也同时制约并规定着这种互动模式的形式与程度。青年群体有更多的自主性去选择媒介,更倾向于社交化、小圈子化,那么作为主流文化的主导传播方,就应该顺应潮流,跟上青年步伐。但这又不仅仅是把传播阵地转换为网络新媒体的问题,更在于理解这个社会的环境、触摸时代的脉搏,用文化的形式与青年对话,如果只是换个环境进行传统的老旧宣传,其结果只能是浪掷又一个传播平台。

从第三个维度来看,也许问题更加复杂,但前景却未必灰暗。

我们除了从微观、中观的层面考察、反思主流文化的传播传承问题,还更应该回到问题的原点,即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如果一定要说这些活动都是充满政治性的活动,那么这种互动是否仅仅只是为了社会的控制、思想的钳制?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阿拉苏塔瑞的观点来看,这项浩大的工程本来就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行为,尽管上文对现有的传播行为和效果多有反思甚至是批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不断的试错和磨合过程中,官方也在修正自己的传播行为,这也是前景未必灰暗的缘由。

更为重要的理由在于,在全球民主化持续推进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道路,面对当前的情况,如何提高政治参与成为更为重要的话题。尽管我国网民相较于他国,更倾向于网络议政,但青年一代逃离政治的倾向无法掩盖。背后的问题在于没有参与就难有认同。如果对于政治缺乏认同,就容易产生更为尖锐的矛盾,即毫不关心——你的主流文化是你的文化,我的自主生活是我的选择。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那么本文的整个命题就不再存在。

因而,从宏观上看,提出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传承受情况的反思,表面上是对我们现行国内政治传播的一次实践巡检,而实际上更是对如何网聚人心、如何增强认同、如何打造生活共同体的思考。在这种关系的培育过程中,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已经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他的交往理论上把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转换成为交互主体,这种主体间性的主张是对主体性的扬弃。如果把主流文化的传播双方看作主客体的关系,难免会产生一方为主的唯我论等偏激的价值取向,而这种片面的关系并不利于价值的传承和关系的发展。主体间性则不同,主体间性强调的是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以实现认同与达成共识。“主体”与“客体”的身份不是固化的,他们的关系实为一种对象性关系,互为对象的双方都具备主体性。主客体身份界限模糊在互联网时代的官民沟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要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并促使其解决。

#### 四、结语

尽管青年群体更多地“移民”网络,但显然官方也意识到要“阵地转换”。自2014年起,官方的各种措施也加快了“网络国家队”的建设,青年群体与官方注定要在网络场域华丽接触,而不同的文化与价值也将在这里碰撞,而且不少“网络国家队”表现优秀,收获了点赞。但需要指出,现阶段我们不缺新兴媒体,不缺主流媒体,但“新兴主流媒体”还在酝酿。

我们看到成立于2013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其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在该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同样是2014年,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在8月重组升级,终结了我国互联网此前的“九龙治水”的情况,在上述思想、文件的指引下,可以期待的是我们的互联网政治传播将会有更好的推进。

传播学中的芝加哥学派有一个信条,即阐述一个社会问题就能够促使它的解决。因而,本文的结语重点并不在于给出具体的操作性“对策”,解决之道往往已经寓于问题的分析之中,简言之,就是需要在上述各个层面进行意识转换和行为纠偏。

第一,主流宣传阵地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需要更有针对性地改变固有编码思维,既要适应社会环境变迁对主流文化导向传播的压力,也要考虑特定人群,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认知习惯和接受特点,提高青年接触的兴趣,降低解码阶段的门槛。这是受众本位的思维要求。

第二,“阵地转换”后需要传播手段与传播平台配对。新闻传播当然存在其客观的规律,尊重规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现阶段仍然存在传统思维管理新兴媒体、旧脑筋束缚新趋势的现象,即新的平台没有匹配恰当的传播方式,此举不仅荒废平台,更会增加双方的疏离感。这是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要求。

第三,在这场“双向塑造”的互动过程中,以政治参与促进政治认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主流文化在青年群体中间的传播过程实际上并不存在葛兰西所谓自上而下的“收编”或者自下而上的“抵抗”,而应当是在一个尊重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唤醒青年当家做主的主体性,才能破除一切政治逃离和政治疏离感。

官民注定要在互联网中碰面,在这个场域中,不仅需要强调协商的重要性,双方更应该意识到,在协商之前需要有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的远见和胸怀,这对于官方来说更是应有之义。因而,问题也完全可以划归为技术性的问题,这也是官方早就解决、但是一直被“高语境化”了的问题,即“三贴近”、“走转改”、“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如何把这些“高语境”的语汇转化为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触摸到的变化,让青年群体能够切身感受到不仅在话语层面、更在行为层面的深刻转变,提升其对于主流文化的传播期待,进一步增强其政治参与的意识,这是能否赢得青年群体接纳的根本。

### [ 参 考 文 献 ]

- [1]沈 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社会心理》,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2]李毅红:《青年概念的当代阐释》,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 [3]黄志坚:《谁是青年?——关于青年年龄界定的研究报告》,载《中国青年研究》,2003年第11期。
- [4]劳伦斯·斯滕伯格:《青春期》,戴俊毅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39页。
- [5]李庆本:《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 [6]卢衍鹏:《主流文化的解构与文化研究的重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4期。
- [7]王一川:《走向文化的多元化生——以文学艺术为范例》,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8]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 [9][10]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 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3页。
- [11]Antonio·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 161.
- [12]胡 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